

辛亥革命

与

世界

王晓秋◎主编

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辛亥革命 与世界

王晓秋◎主编

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世界: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晓秋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01-22844-9

I. ①辛… II. ①王… III. ①辛亥革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5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8078 号

书 名: 辛亥革命与世界——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王晓秋 主编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844-9/K·09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42 印张 97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王晓秋	/1
论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	钱乘旦	/10
略论中国革命的法兰西风格	高 毅	/18
论 20 世纪初在巴黎及法属印度支那中国共和主义派与 法国共和主义派的关系	[法]巴斯蒂	/23
留欧知识社群与孙中山革命	陈三井	/32
乙未、辛亥及辛亥百年英语报章论点的变化	[澳]黄宇和	/42
辛亥前后中、日、美商人的交往及其影响 ——多元文化交涉对辛亥革命的意义	马 敏	/51
华盛顿形象的中国解读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熊月之	/73
美国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	[美]麦金农	/93
试论外国记者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报道 ——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为中心	窦 坤	/98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美国和欧洲的活动	谢 放	/118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人之关系初探	邵 雍	/127
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 ——共和革命的扩散与反帝连带的摸索	[韩]裴京汉	/134
韩国儒学者李承熙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的认识	王元周	/143
辛亥革命与东南亚	梁志明	/161
孙中山与越南华人华侨	[越]吴雪兰	/174
略论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宣传	裴 艳	/185
海洋亚洲 ——孙中山革命思想传播的路径及其诠释	侯 杰 王小蕾	/194
大陆浪人与辛亥革命 ——论所谓“连带”的接点和性质	姜克实	/203
亚洲主义、亚洲共同体理念的对立与冲突 ——孙中山、石原莞尔的比较	赵 军	/214
辛亥革命与日本大学	[日]小島淑男	/231
辛亥革命爆发后伊集院彦吉对中国时局的观察及其主张	戴东阳	/239

日本法政大学与辛亥志士小考	王 敏	/260
从憧憬到敌视		
——辛亥前后的戴季陶与日本	张玉萍	/273
辛亥革命与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关系的新探讨		
——兼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林 泉	/285
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排外观	李育民	/296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	陈争平	/313
五大臣出洋活动中的革命因素	陈 丹	/325
拒请与申入:近代中国与万国电报公会	夏维奇	/334
辛亥时期清政府书报检查实施中的外国因素	张运君	/348
辛亥革命与中外革命损失赔偿交涉初探	宋芳芳	/359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张 磊 张 革	/370
孙中山、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谢俊美	/390
孙中山思想价值的再认识	赵春晨	/397
归国与开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心路行迹释意	廖大伟	/404
关于孙中山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		
——兼论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发展	臧运祜	/420
近代国家建设之路		
——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历史解读	欧阳哲生	/431
以美国为师与以俄国为师		
——对孙中山《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的解读	杜 语	/440
辛亥革命时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国家认同	李 帆	/453
革命失败之后的反思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失败》初考	蔡乐苏 岳秀坤	/458
宋庆龄与辛亥革命	盛永华	/473
辛亥革命:清朝“制造”的革命		
——以容闳为样本的历史解读	李喜所	/484
乌头马角恨茫茫		
——论汤化龙与辛亥革命	马铭德	/493
辛亥革命时期清朝官员的离心与反叛		
——以岑春煊为主要分析案例	郭卫东	/504
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选择	刘贵福	/523
动员排满革命的明清史知识:陈去病编写的文献、小说及戏剧	区志坚	/530
英伦蹈海烈士之真史		
——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	孔祥吉 郑匡民	/546
孙中山与青岛	张树枫	/568
上海:一座城市的辛亥革命	苏智良 江文君	/586

新式教育与辛亥革命	
——以浙江为中心	戴鞍钢 /601
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解放	
——论辛亥革命与民初时期婚姻文化的变革	梁景和 /609
辛亥革命与票号衰败	姜占英 /621
百年辛亥:政治革命的丰富性及其思想超越	邱 涛 /632
百年辛亥,革命新议	魏楚雄 /639
辛亥革命的抱负与目标	[美]于子侨 /653
辛亥革命与世界	
——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崔学森 /658
后记	/664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王晓秋*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当我们用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去考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而且还要看到它也是 20 世纪初世界历史上一次具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和阐发辛亥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同时也应该深入研究和阐发辛亥革命的重大世界意义。

以往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较少有专门的研究和探讨。即使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中,一般也只是简单罗列几条结论,而且往往过于笼统和抽象。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认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呢?我认为不但需要站在世界和时代高度作宏观理论分析,而且需要作扎扎实实具体深入的微观实证研究。从超越中国地域局限的大量外国史料和史实出发,去进行认真的解读、剖析和阐发。本文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作比较深入的再探讨。

1916 年 9 月,孙中山在浙江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时,受到汹涌澎湃的浪潮启发,写下了著名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①我认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从宏观上讲,正是顺应了 20 世纪初世界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股世界与时代的历史潮流。

列宁对中国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辛亥革命不仅标志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②。而且也意味着“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经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③他还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

① 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17 页。

② 列宁:《新生的中国》(1912 年 11 月 8 日),《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08 页。

③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 年 3 月 1 日),《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 页。

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④。

二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过去我们在阐发这一意义时,常常强调因为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已是“洋人的朝廷”,所以推翻清政府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不够全面,而且过于简单化。实际上,中国当时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最大的一块半殖民地,也是列强在亚洲激烈争夺的“仅有的富源”。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各种手段,特别是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领土、主权和财富,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 and 驯服工具。因此,帝国主义决不愿意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当然更不愿意中国从其掠夺、奴役的对象变成与其竞争、抗争的对手。我们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种种反应言行中,具体考察辛亥革命究竟如何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势力。

受辛亥革命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统治集团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主要侵略扩张对象通过革命变成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日本前首相、军阀、元老山县有朋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⑤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辛亥革命抱着仇视敌对的态度。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贞村雄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报告中,就把革命军称为“暴徒”^⑥。日本政府闻讯立即增派军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一边保护日本在华利益,一边监视革命军的行动。同时伺机进行武装干涉,甚至阴谋策划分裂和蚕食中国。日本陆军和海军分别拟订了出兵占领大沽口和长江口等战略要地的计划。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甚至还建议:“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继续维持统治。”^⑦

辛亥革命的一大丰功伟绩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对在天皇制统治下的日本冲击很大。日本军部担心中国的共和革命会引起日本天皇制的危机。陆军的一个文件警告:“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此所谓天下成败之秋也。”^⑧政论家德富苏峰甚至把中国革命比作“瘟疫”,叫嚷:“鼠疫乃有形之

④ 列宁:《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161页。

⑤ 密勒:《民主政治与远东问题》,引自沈巨光:《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⑥ 松村驻汉口总领事致外务大臣电(1911年10月11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⑦ 伊集院驻华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0月28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112页。

⑧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7页。

病,共和制乃无形之病。”^⑨当时,有一位英国作家曾这样生动描绘日本统治集团对中国建立共和制度的恐惧心情:“如果近在咫尺的中国,一个中央君主制王朝,能够像一个苦力一样,被一脚踢开。那么,在日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如果在中国,清王室能够被发给年俸而令其退位。那么,这同样的办法,难道不会施用于日本的天皇与藩阀官僚吗?”^⑩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经竭力企图在中国维持君主政体。1911年12月22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对袁世凯说:“万一贵国变成共和国体,我国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仅从此点出发,我国也要支持贵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尽可能促其实现。”^⑪12月24日,日本天皇召开研究对华方针的元老会议,再次重申:“帝国政府认为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为解救清国时局之最良方策。”^⑫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列强的意见分歧,日本政府才无可奈何地表示,“暂时听任事态之自然发展”,并希望清政府“充分理解帝国政府曾为清国皇室及其国民煞费苦心,直到最后仍在尽最大努力设法维持”。^⑬

日本统治集团还害怕中国的辛亥革命会刺激朝鲜等日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助长日本国内革命思想的传播,动摇他们的统治。日本驻朝鲜殖民总督寺内正毅指出:“中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试观今日我新闻界青年之辈种种议论,即可得知。”他强调,“当局须对这种趋势有相当之认识方可”。^⑭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更明确提出:“我国如果同情邻国的叛乱(指中国的辛亥革命),就会影响新附的鲜民(指刚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民)。而且一方面严禁国内的危险思想,一方面又承认外国的危险行为,这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⑮因此,日本《报知新闻》公开鼓吹:“必须最低限度地抑制清国的祸乱,以杜塞两国彼此的危机。”^⑯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辛亥革命引发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反帝国主义情绪普遍感到担忧。1912年3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拉尔德在给法国陆军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在这儿的常驻外交代表们几乎一致认为,排外情绪隐藏在所有中国人的灵魂中,不管是‘旧式的’或者是‘少年中国’时代,某一次事端、一个谣言或仅仅是骚乱的延长,都足以使排外情绪表现出来。”^⑰1912年12月20日,英、法、德、日、俄、美六国驻上海总领事给南北议和双方代表的照会说,六国政府认为“目前中国战事的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大利益和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⑱

法国驻华公使裴格1911年12月8日在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对辛亥革命冲击法

⑨ 德富苏峰:《对岸之火》,《国民新闻》,1911年11月12日。

⑩ A. M. 波列:《日本的外交政策》,伦敦,1920年版,第64—65页。

⑪ 伊集院驻华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13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12页。

⑫ 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华公使电(1911年12月24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16页。

⑬ 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华公使电(1911年12月26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26页。

⑭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6页。

⑮ 《大阪朝日新闻》1911年10月27日。

⑯ 《报知新闻》1911年11月14日。

⑰ 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912年3月22日),法国陆军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⑱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12月28日)附件2:同文照会。《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0页。

国侵略势力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表示忧心忡忡。他说:“实际上,将逃不脱这种必然的后果,即本来是一场反满清皇朝的运动,突然变成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并且可能给印度支那带来一系列困难,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骚扰边界地区,甚至引起我殖民地内部的混乱。”^①

在中国拥有最多侵略利益的英国帝国主义,也担心辛亥革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希望稳定局势,维护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武昌起义后,英国政府不仅用武力保护其在汉口的殖民据点——租界的安全,而且还想趁机扩大租界的范围。英国驻华舰队司令温思乐海军中将鼓吹:“为了各国租界的安全起见,绝对有必要把这些租界扩展到铁路线,而且把那些居住在这个中间地带的中国人驱逐出去。”^②

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列强曾支持中国保持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制。1911年11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对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表示:“外国人的一般看法认为,此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满清王朝作为国家的象征元首,而同时如所承诺地作立宪的改革。共和政体的政府在我看来仍不适合于中国,而是一项冒险的尝试。”^③因此英国支持袁世凯以“妥协辅之以武力”对付南方革命派并维持君主立宪的方针。相反,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却是比较冷淡甚至苛刻的。1911年11月,孙中山即将途经香港回国时,朱尔典向外交大臣格雷报告:“本人与香港总督皆认为,鉴于局势变化,我们无法阻止孙中山过境香港,但必须警告他不可停留香港从事革命活动。”^④唯恐影响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威廉1911年10月12日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武昌起义是中国“自太平天国事变以来最严重之叛乱”^⑤。从美国侵华利益出发,美国政府对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评价和态度截然不同。1912年1月16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报告中,赞扬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富才干之人”,而认为孙中山只是一个广东地方性的政治人物。因此,“孙逸仙能否掌握全局并统帅倒满之后各种不同之冲突势力及利益,颇值怀疑”^⑥。

沙俄帝国主义也不愿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强大起来,而更希望中国分裂。1912年1月10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章中提出,俄、日两国是中国的邻国,“在中国有远比其他各国重要的政治利益。因此,俄、日两国应利用目前特别有利的时机,以巩固其在华地位,并制止中国政府近年来所追求的、旨在反对俄日两国上述重大政治利益的政策”^⑦。1912年11月9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致俄国驻北京公

^① 裴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年12月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238页。

^②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7日),《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87页。

^③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4日),法国外交部档案,《辛亥革命资料新编》第8册,第100—101页。

^④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0日),《辛亥革命资料新编》第8册,第106页。

^⑤ 杨日旭:《美国国务院外交关系文书中关于中山先生的记载》,见《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2册,台北:1985年版,第201页。

^⑥ 杨日旭:《美国国务院外交关系文书中关于中山先生的记载》,见《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2册,第201—202页。

^⑦ 外交大臣呈尼古拉二世奏章(1912年1月10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7—258页。

使廓索维慈的信中说：“我们认为，将中国划分成一个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邦，符合广义理解的我国利益。”^⑤

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些言论，不正是他们受到中国辛亥革命的冲击同时又竭力维护与扩大其侵略利益的有力证据吗？

三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还表现在它是 20 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的觉醒”的主要标志。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而且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并援助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列宁曾经把 20 世纪初中国、印度、印尼、波斯、土耳其等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称为“亚洲的觉醒”，而且高度评价中国的辛亥革命。1913 年 5 月 16 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亚洲的觉醒》一文，指出：“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他还说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在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们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⑥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还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⑦

辛亥革命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推动和支持，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实的。

例如，辛亥革命使正处于革命低潮的越南革命者深受鼓舞，重新振奋和组织起来，推动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出现。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潘佩珠于 1912 年初来到中国广州，接着其他越南革命者也纷纷前来，两三个月内就聚集了一百多人。1912 年 2 月，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沙河抗法英雄刘永福故居的刘氏祠堂集会，决定把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越南维新会改组为争取民主共和的越南光复会。通过革命纲领为“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推举潘佩珠为总理，领导机关分为总务、评议、执行三个部，并决定组织光复军，制定国旗、军旗，还仿效孙中山发行军用票的方法筹集资金。这可以明显看出，越南光复会从纲领到组织、活动，都深受中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当时越南人民还在家里公开悬挂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以表示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敬仰。

中国革命党人也积极支持和援助越南民族解放运动。1912 年 2 月，孙中山于公务繁忙之中在南京接见了潘佩珠，并邀请他旁听了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会议。黄兴也与潘佩珠进行了几次会谈，黄兴表示“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⑧，还建议越南革命者派青年学生入中国军校或军营，以储备革命人才。以后，便有不少越南革命青年进入

^⑤ 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俄国外交文书选译》，第 200 页。

^⑥ 列宁：《亚洲的觉醒》（1913 年 5 月 7 日），《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160—161 页。

^⑦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 年 3 月 1 日），《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3 页。

^⑧ 《潘佩珠年表》第 78 页，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 669 页。

广东、广西等地军事学校学习,为越南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潘佩珠从南京回广州途经上海,拜访了当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陈其美慷慨赠其革命经费4000元和炸弹30枚等武器弹药。

为了推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的积极支持下,1912年8月,中越两国革命者在广州共同组织了一个援越抗法的革命团体振华兴亚会,有200余人参加。以中国同盟会会员邓警亚任会长,越南潘佩珠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振华以兴亚”,“第一步为援越南,第二步为援印度、缅甸,第三步为援朝鲜”^③。该会还计划筹组援越军,后因形势变化而未能实现。

韩国(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很大影响。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被日本吞沦为殖民地。不少韩国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东北等地。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使他们感到振奋和鼓舞,有的韩国革命者特地赶往南京和上海,近距离观察感受中国革命,并探索韩国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如韩国爱国者李泰俊在1911年末流亡中国的动机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的怨恨日益加深的时候,被震撼天下的大陆的革命军消息所感动而启程的”^④。后来任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部长的金奎植也是听到辛亥革命消息而于1912年秋天流亡上海的。而郑元泽则是获悉“中国正在兴起孙中山和黄兴为中心的革命运动,韩国的有志青年也参见了”的消息后,于1913年初流亡上海、南京。

与辛亥革命及中国革命党人发生更密切关系的是韩国独立运动领袖申圭植。他在1911年11月下旬,中国武昌起义消息传到韩国后,便从汉城出发渡过鸭绿江,经沈阳到北京。12月中旬,又离开北京,途经天津、济南、青岛到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国革命党人戴季陶创办的《民权报》的工作,并在该报发表文章,还使民权报社成为上海流亡韩国学生的联络处。申圭植曾写汉诗献给孙中山和黄兴,歌颂中国革命和革命领袖,诗中写道:“共和新日月,重辟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岁尊。”^⑤而黄兴曾回信表达对韩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表示要“永远协助韩国人,使之迅速成功,共享自由幸福”。^⑥1912年4月申圭植终于在上海见到了敬仰已久的孙中山。他在孙中山下榻的汇中旅馆经胡汉民介绍拜见了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虽然交谈时间不长,但对申圭植鼓舞很大,他不禁激动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并在1912年4月18日的《民权报》上发表了《拜谒孙中山记》一文。^⑦申圭植在上海还曾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交往,并受到过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援助。

申圭植等韩国爱国志士在中国辛亥革命的鼓舞启发下,开始探索韩国民族救亡光复祖国的道路和方法。1912年7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爱国团体同济社,以互相帮助、同舟共济为名团结韩国流亡者和青年学生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为以后进一步发展独立运动和

^③ 《潘佩珠年表》,引自杨万秀、周成华:《孙中山与越南》一文,见林家有、李明主编《孙中山与世界》第56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④ 裴京汉:《武昌起义后中韩纽带的开始》,《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029页。

^⑤ 裴京汉:《武昌起义后中韩纽带的开始》,《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043页。

^⑥ 裴京汉:《武昌起义后中韩纽带的开始》,《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031页。

^⑦ 《拜谒孙中山记》,《民权报》,1912年4月18日,第11页。

成立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打下基础。申圭植后来担任 1919 年在上海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法务部部长和国务总理。同时,韩国革命者又与中国革命党人联系,共同创办了新亚同济社的组织,有不少中国同盟会重要人物参加,如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成为中韩两国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支援和联络的纽带。

此外,辛亥革命还对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当地华侨起作用的。

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和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是荷兰的殖民地)时,印尼广大爱国华侨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中国革命的成功。1912 年 2 月,雅加达等地华侨上街游行,升挂中华民国五色旗,燃放鞭炮,却遭到荷兰殖民当局镇压。荷兰殖民政府逮捕华侨多人并发布禁旗令。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印尼华侨的坚持斗争下,荷兰殖民政府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华侨,取消禁旗令。

辛亥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尼华侨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意志,而且也刺激和推动了印尼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1912 年成立了伊斯兰联盟等民族主义组织。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哈达在一次演说中曾指出:“1911 年中国革命推翻了世代相传的满洲政权,而代之以中华民国,要与欧洲国家享有平等权利和地位。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伟大事件中唤醒了印尼华侨心中的民族精神。他们对自尊心的觉悟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之中。而这种情况也激动了印尼人民之心,并且促进了由伊斯兰联盟组织起来的最早的人民运动的出现。”^⑤

辛亥革命对印度的影响以前研究较少。实际上孙中山、章太炎等在日本流亡期间就与印度爱国志士交往,并关心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辛亥革命后,印度革命者对孙中山更加仰慕,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甘地、高士等都把孙中山看成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印度革命家哈尔·达雅尔在美国时会晤过孙中山。1913 年他在美国旧金山建立太平洋沿岸印度人协会即卡德尔党时,把孙中山作为这个组织最崇敬的世界民族英雄之一。卡德尔党成员还常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辛亥革命来鼓舞自己的斗志。该党领导人之一穆拉·辛格说:如果中国人能建立共和国,印度人为什么不能?“我们必须走中国和另外国家所走的路,实现印度的革命。”^⑥

值得注意的还有辛亥革命对日本民主运动的影响。当时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发表了不少声援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实行共和制和反对政府干涉中国的言论。同时也希望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来表达对当时日本天皇、军阀、官僚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反对,并借此启发民众的觉醒。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辛亥革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日本大正初年的护宪运动和“大正政变”。

《社会政策》主编和田三郎发表文章批判鼓吹干涉中国革命的言论。他指出,如果因为中国不采用日本一样的君主制就要干涉,那等于“以别人不与自己戴同样的帽子就去打那个人的头一样,是野蛮的,粗暴的”。他还说:“我国人民虽然愚昧,但如果眼前展现出比我国先进之国家,实施自由之政治,则不能不觉醒。一旦觉醒,就将打破官僚统治。”

^⑤ 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 91 页。

^⑥ 古普塔:《印度革命运动史》,孟买,1972 年版,第 42 页。转引自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9 页。

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现今的官僚政治家不正是有恐于此，才想假借皇室安危之名，干涉中国的共和制吗？”^⑤早稻田大学教授永井柳太郎也指出要支持中国革命，首先应在日本“唤起国民运动，驱逐阀族统治”。^⑥

由于日本藩阀、军部的横行和对宪政的破坏，激起日本广大民众的愤怒，加上中国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刺激鼓舞，日本在1912年（日本大正元年）到1914年爆发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推翻了两届军阀反动内阁，在日本历史上又被称为“大正政变”或“大正维新”。正在日本护宪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孙中山于1913年二三月来到日本考察，并到各处演说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和共和政体的由来，这无疑等于在日本护宪运动烈火上加了一桶油，对日本人民争取民主维护宪政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位日本诗人特地写了一首《给孙逸仙的诗》：“呜呼，一世之鼓吹家，无冕的革命王孙逸仙，乞君淹留二月春，待日本宪政花开时，采一枝樱花来相赠。”^⑦反映了日本人对孙中山的仰慕并期望护宪运动胜利的心情。日本学者稻垣伸太郎认为，“在大正新时代的新政治之一，就是要去除藩阀、官僚这些明治时代留下的弊害，进行政治上的一大革命。也就是说，大正维新意味着第二个中国革命”^⑧。

四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还体现在它在世界上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及振兴亚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思想主张，对亚洲以至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深入阐发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当时亚洲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中最为丰富、完整，也是影响最大的思想。

列宁1912年7月15日在俄国《涅瓦明星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⑨同时，列宁也深刻地剖析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中的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但提出的却是一个“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⑩。列宁还告诫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批评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

^⑤ 和田三郎：《国际上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1911年12月号。

^⑥ 永井柳太郎：《代中国人作文嘲笑日本人》，《中央公论》，1913年1月号。

^⑦ 儿玉花外：《给孙逸仙的诗》，《太阳》，1913年3月号。

^⑧ 稻垣伸太郎：《中国革命和我们的阀族政治》，《日本及日本人》，1913年1月15日。

^⑨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427页。

^⑩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430页。

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④3}。列宁的这些论断是值得我们好好领会和深思的。

孙中山的思想早在他流亡日本时就受到亚洲各国革命青年的推崇。当时与孙中山有交往的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1912年在马尼拉出版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热情赞扬孙中山是一位冷静而有理想的思想家、演说家。他写道:“孙中山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④4}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曾多次谈到他如何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1956年10月4日,苏加诺总统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的演说中回忆道:“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的灵魂。”^{④5}苏加诺还说,后来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接触到的其他理论及印尼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成为1945年提出的“五民主义”——“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原则”)。

1956年8月15日,苏加诺于雅加达在为宋庆龄举行国宴的演说中,也讲到“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他还说,他是在阅读了孙中山的著作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亚洲是一家”这个概念的。他认为“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④6}。

苏加诺还曾经对印尼记者陈盛智说过:“本人从18岁起,参加伊斯兰联盟,那时不知什么叫民族主义,后来拜读了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才知道民族主义的重要。孙先生的民族主义,不单为中国,它并且适用于亚洲一切弱小民族。所以我敢说,要实现孙先生的理想,一定要使亚洲没有一个被统治的殖民地,为此,我对中国寄予极大希望,希望中国将援助要求解放独立的亚洲民族。”^{④7}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振兴亚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思想对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革命者都有影响,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之,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还是一个需要不断开拓和深入挖掘、尚有很大潜力的课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也希望世界各国学者发掘和利用各种外文资料,共同探讨这一课题。

^{④3}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432页。

^{④4} 彭西:《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转引自周南京:《菲律宾与菲华社会》,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79页。

^{④5} 苏加诺在清华大学的演说(1956年10月4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期。

^{④6} 苏加诺在招待宋庆龄国宴上的演说(1956年8月15日),周南京、孔远志主编:《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第119页。

^{④7} 苏加诺对印尼华人记者陈盛智的谈话(1947年),周南京、孔远志主编:《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第116页。

论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

钱乘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明确,对此,中国史学界似乎已有共识。^①然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如何?这个问题好像论者甚少,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讨论。

—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动荡,就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全世界正同时进行着几场革命,这些革命都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引发世人的深切关注,按时间排列分别是: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14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1911—1912年的中国革命。从地理分布上看,革命狂飙横扫整个世界,席卷新旧大陆。

为什么世界诸多地区同时发生革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顾这些革命的基本情况:

(一) 伊朗革命:19世纪末,伊朗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国家被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划分为势力范围,而统治的恺加王朝腐败不堪,不断出让国家主权。外国入侵与王朝腐败交互作用,加剧了国内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民众掀起反对向外国出卖烟草专卖权的斗争,这成为20世纪革命的先声。1905年,以一位民族主义分子被杀为导火线,伊朗爆发革命。但在外国势力的直接干预之下,革命完全失败,此后十多年中国一片混乱,直至礼萨·汗夺权才扭转局势。^②

(二)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中东地区强大的国家,几百年中与欧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

① 例如金冲及:“它的结果,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扫除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这个巨大障碍;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张海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② 关于伊朗革命,可参见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章“伊朗立宪革命”。1921年礼萨·汗夺权,1926年建立巴列维王朝,伊朗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洲对峙,表现出强大的活力。西欧发生现代化转型后,一方面由于外来的压力,一方面因为内部的腐化,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到19世纪,已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20世纪初由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革命,政权也转入革命者手中。但青年土耳其党人把奥斯曼帝国拉进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帝国解体,不仅其内部的被统治民族纷纷独立,连土耳其民族都差一点丧失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土耳其由此获得新生。^③

(三) 墨西哥革命:墨西哥是南美洲国家,1821年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此后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长期陷于“考迪罗”(军事强人)统治之下。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迪亚斯实行了30多年的独裁统治,这段时间中墨西哥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成绩斐然,另一方面则社会冲突加剧、外国势力侵入并控制了主要的经济命脉,其中以美国为最。1910年墨西哥爆发革命,推翻了迪亚斯政权。经过多年的角逐,最后在1917年取得决定性成果。墨西哥革命是同时期四大革命中真正取得实质性成功的一个,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颇有示范意义。^④

(四) 中国革命(辛亥革命):从1840年起,中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由于清朝日趋衰落,内部矛盾持续爆发,西方列强又乘虚而入,中华帝国步入绝境。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多次发动救亡图强的努力,但一概失败了,其情景极似走上末路的奥斯曼帝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成为中国的唯一出路。革命爆发后,清王朝迅速瓦解,革命政府也顺利建立,但随后很快就出现形势逆转,革命的果实也瞬间旁落。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在辛亥时期只是刚刚开了头,此后的道路异常曲折。因此孙中山在临终之前不得不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⑤

与这四次革命几乎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其他一些重要事件:

首先是俄国革命,它在1905—1907年首次预演,在1917年进入高潮,到1920年,一种新型国家体制——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已牢牢确立了。革命前的沙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从17世纪开始就急剧扩张,不仅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而且不断侵占周边领土,欺辱欧亚邻国。但俄国又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西欧列强眼中,它是个野蛮的东方帝国,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完全赶不上欧美潮流。20世纪初的俄国具有一副双重面孔:对欧亚小国来说,它是凶恶的侵略者;在西方列强眼中,它是野蛮而落后的东方国家,随时可以遭受西方的打压:日俄战争的失败引发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则直接导致1917年革命。^⑥ 革命后的苏联在20世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俄国的强国之路至今仍未走完。

其次是印度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自1857年发生反英民族大起义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就不断增强,到19世纪80年代,已成立后来领导独立运动

^③ 关于土耳其的改革和革命,可参见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二章第三节“从专制君主帝国到现代民主共和”。

^④ 关于墨西哥革命,可参见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彼得·H.史密斯:《现代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七章“墨西哥:革命与稳定”。

^⑤ 关于辛亥革命的中文参考文献极为丰富,此处不一一列举。

^⑥ 关于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可参见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章“专制制度与立宪改造”和第二章“革命和内战”。有一本书生动细致地描述了1917年发生的各种事,可以帮读者深刻了解十月革命,见王云龙、苍松:《1917年俄罗斯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